

抗日戰爭時期大師遠走重慶。勝利後，大師於一九四六年回到南京，是年冬來甬，住延慶寺，曾宣講『彌勒上生經』及舉辦『菩薩學處』。當時亦幻、芝峯諸師都隨侍左右。大師曾去雪竇寺及奉化大橋岳林寺、中塔等處，幻師遣我陪同前往。過農曆年時，由育王寺源龍和尚延去度歲。至正月初八，幻師念師心切，遣我至育王接回延慶寺。在此期間，並應萬壽寺源音和尚邀請，前往參加傳法之盛。農曆二三月間，接上海玉佛寺震華法師圓寂噩耗，大師親自赴滬為震師起龕舉火；繼而又遭『覺羣』編輯福善法師逝世之痛。大師悲憫人生，內心極度震悼，竟突患腦溢血圓寂於上海玉佛寺，時年五十有九。大師靈骨，由滬護送來甬，專車送至雪竇山上起塔。

大師的一生，最為人稱道的有如下數端：

勤奮求學，參悟教理

大師出身於貧寒家庭，五歲喪父，六歲喪母，幼年又多病，由外祖母周氏撫養成成人，十五歲在海寧縣長安鎮一家百貨商店做學徒，因不願為店主作家庭瑣事，萌發出世之念，十六歲即到蘇州平望一個小寺院拜士達和尚為師，剃髮出家。不久由士達帶到鎮海團橋鎮玉皇殿師祖契年和尚處，再由契年帶到天童寺向寄禪和尚受具足戒。因天資聰慧，甚得寄禪悉心指點，自己又能刻苦求學，文化大進。二十歲在慈溪西方寺時，讀康有為『大同書』、嚴復『天演論』、譚嗣同『仁學』及梁啟超、章炳麟（太炎）等有關國事與佛學的論文，極為欣賞，觸動了改革佛教的想法，以佛教救國、救天下相自誓。不久又結識了熱心民族革命、參加同盟會的棲雲和尚，棲雲介紹他讀鄒容的『革命軍』及當時出版的『民報』及『新民叢報』，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。二十一歲去南京「祇園精舍」就學。這是一所供僧伽與居士進修的佛教學院，創辦人楊文會（別號仁山），精通佛學，有名於時。大師在那裡聽了幾個月講座，大有精進。回寧波後，任普陀山化雨學堂教員。廿二歲隨棲雲和尚去廣州，組織佛學精舍，講學著述，並

參與革命的各種秘密集會，與同盟會中人如朱執信、鄒海濱、潘達微等過從甚密。二十六歲在普陀山閉關期間，專心參禪禮佛，讀書著述，對大乘八宗的天台宗、華嚴宗、法相宗、禪宗、律宗、淨土宗、密宗、三論宗都加以專心研究，著『破神執論』、『震旦佛教衰落原因論』、『教育新見』、『哲學正觀』、『辨嚴釋』、『訂天演』、『論荀子』、『論周易』、『論韓愈』、『百法明門論及宇宙觀』、『墨子平論』等。從這些論著來看，可知他讀書之多與鑽研之努力。此外又寫成了『佛法導論』及『整理僧伽制度論』。他一生著述豐富，是近代佛教界最突出的一個。他的佛學思想是屬於唯識宗。他認為小乘可附屬於大乘，即所謂「附小於大」。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，至於天台、華嚴、三論、法相、禪、律、淨土、密這大乘八宗，它們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極果都是一致的，並沒有優劣高下之分，只是說明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。這就是他所說的「八宗平等」。

銳志改革，培養僧才

大師一生力主佛教改革。當一九一三年寄禪法師圓寂，上海佛教界舉行追悼會時，大師即在會上提出「教理革命、教制革命、教產革命」的口號。他所寫的『整理僧伽制度論』，代表了他改革佛教的具體主張。他把舊日佛教僧伽的組織分作了「教所」、「教團」、「教籍」、「教產」、「教規」加以整理，一一訂立革新的制度。其最突出之點，是主張政教分離，建立由僧伽統一自主的僧團。

大師的革新主張，受到廣大僧衆的擁護，但也受到一部份守舊者的反對，因此也有過激烈的鬥爭。如一九一二年，在鎮江金山寺開「佛教協進會」成立大會，由於新舊兩派僧衆相互辯論，竟至發生「大鬧金山」事件。一九二一年，大師主持杭州淨慈寺，當他應邀北上參加「辛酉講經會」之際，浙江省的一些舊派人物，慫恿省長下令撤銷大師的淨慈寺住持職位。大師在北京獲悉，上訴於平政院。後來大師回杭，大總統徐世昌頒贈了「南屏正覺」

匾額一方，同時「辛酉講經會」又公推倪德薰、康有爲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師回淨慈寺。這樣一來，撤銷住持職位一事就烟消雲散，不了了之。一九二八年時，蔣介石邀大師到南京講「佛陀學綱」，大師得蔡元培等的贊助，創設中國佛學會，並籌組中國佛教會。大師提出了「三佛主義」口號。內容是：一、佛僧主義。建立「有主義、有組織、有紀律」的革命僧團，堅持寺產屬僧衆所共有，嚴守戒律，對違犯者要規勸以至於勒令還俗。二、佛化主義。即大力發展佛教徒，只有僧侶組織是不夠的，還要建立居士組織。三、佛國主義。即用佛教影響國家，以至於全世界。

大師自己是從南京「祇園精舍」起，得到佛學上的深造的，自然深切體會舉辦僧學的重要。他先後組織過「佛學精舍」（廣州），「永明學舍」（杭州），「佛教慈幼院」（杭州）「武昌佛學院」、「閩南佛學院」、「漢藏教理院」等，對培養佛教骨幹起了重大作用。

弘揚佛學，宣傳抗戰

大師畢生致力於弘揚佛學。除了不斷寫出關於佛學的論著外，還乘周遊各地機會，講經說法。如在台灣宣講「眞常之人生」，「佛法兩大要素」（一九一七年），在蘇州象坊橋觀音寺講「維摩詰經」、「大乘起信論」，在南通講「普門品」，（一九一九年）在杭州講「唯識二十論」、「華嚴經」，在北京講「法華經」、「因明論」、「金剛經」、「大阿彌陀經」等，（一九二一年），在廬山開「暑期講演會」，又發起召開「世界佛教聯合會」，邀請日本、德、美、芬蘭等國佛學家前來參加這個盛會（一九二四年）。他還於一九二五年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東京召開的「東亞佛教大會」。一九二六年遍訪南洋各地。一九二七年被德國朗福特大學中國學院聘爲院董。一九二八年秋赴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比、美等國宣講佛學；應法國學者建議，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；他在巴黎大學講學，穿的是海青，法國人認爲一個中國和尚，居然在國際大學講壇上宣講東方佛學，都刮目相看。他是中國僧侶去歐美傳播佛教的第一人。

他熱愛祖國，反對侵略，抗日戰爭時期，他去到重慶，會率國際佛教代表團前往緬甸、印度、錫蘭（今斯里蘭卡）、新加坡等地訪問，爭取國際佛教徒對我國抗戰的同情，還發動各地華僑捐款支援抗戰。

大師曾任中國佛教總會機關刊物「佛教月刊」總編輯；一九一八年在上海與蔣作賓、章炳麟、張騫、王一亭等居士創立佛學團體「覺社」，主編「覺社叢刊」；一九二〇年，「覺社」移杭州，「覺社叢刊」改名爲「海潮音」月刊，他繼續擔任主編。這些刊物，對宣揚佛教哲學理論，起過很大影響。

平易近人，生活儉樸

大師雖享盛名，但絕無大和尚架子，與其相處，如坐春風，平易可親。他歡喜看書，寫字，下棋，有時說幾句幽默話。有一次他正在寫字，恰巧莊嚴和尚進來，大師笑着對他說：「我要借你的名字用一用，原來他在寫的是「妙相莊嚴」四字。他很關心弟子的進修。一九四六年冬他在延慶寺時，我得以隨時侍奉，他會問起我，今後如何打算「深造」。我那時愚蒙未開，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每逢法會，許多居士慕名前來傾聽，並向他要求書法，他總是一一滿足願望。他對生活抱隨遇而安宗旨，從不計較，經濟上更不在心。他在寧波最後一次逗留時，我們偶然爲他整理隨身物件，竟發現他還有過去在中國銀行儲存的一千元存摺一本，這個存摺，看來他是早已遺忘了。

歸納起來，大師的一生可以「愛國愛教」四字作概括。他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楷模。今天紀念他，要師法他的精神，繼承他的素志，大家爲中國佛教的弘揚光大，作出共同的努力。

對大師的往事回憶，拉雜寫了這一些，可能有許多說錯的地方，懇切希望同仁們的指正。

一九八五年十月於寧波